

新闻学在北大

JOURNALISM
IN PEKING UNIVERSITY

肖东发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闻学在北大

JOURNALISM
IN PEKING UNIVERSITY

肖东发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学在北大/肖东发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ISBN 978-7-301-09333-7

I. 新… II. 肖… III. 北京大学—新闻学—学科—概况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405 号

书 名: 新闻学在北大

著作责任者: 肖东发主编

责任编辑: 杨虎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9333-7/C · 035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25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我们业已走进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21 世纪，刚刚送走的 20 世纪是国人不断觉醒、顽强抗争、历经磨难而又奋发图强的一百年，也是我国新闻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曲折发展并产生影响的一百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正是在 20 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我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理论研究，是在华夏几千年文化传承思想的厚土沃壤中孕育的，是从“西学东渐”的学术理论启蒙中开始的，是从国人对早期报刊实践经验的总结中起步的，是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环境中萌芽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兴起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然而，这股刚刚诞生的新鲜文化血脉在其后的八十年里几经波折，时断时续，成长并不顺利。直到改革开放，新闻学教育与研究才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在这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北京大学对我国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与理论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诸多北大人在新闻学创建的最初实践中的努力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北大不仅是近代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源头，也是当代中国新闻学专业教育的先导，因此被称为中国新闻学的摇篮。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曾总结出北京大学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五个第一”：

早在 1918 年北大就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门新闻学课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蔡元培亲任会长，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曾任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是研究会会员。1919 年，北大出版了由徐宝璜教授所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1952 年，北大是在建国初期全国院系调整后第一个设立新闻学专业的大学。

这“五个第一”充分体现了北京大学学术前辈勇开先河的胆略与智慧，也证明了北大在新闻学专业领域内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在近代中国，以北

大为起点的新闻学专业教育和研究活动为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辉煌的首页。沿此源头进一步梳理分析,不难发现北大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的:

一是老北大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探索。在这一时期,北大既有新闻学专业教育与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又有“五四”期间在新闻实践中的引领风骚;二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建立及其专业课程的建设和研究活动的开展。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与北大的新闻学肇端存在强烈的传承和呼应关系,燕大新闻系的教育制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都为北大的新闻教育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新鲜的教育理念。三是建国后北大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曲折徘徊。在这一时期,北大的新闻学教育在“政治挂帅”的特殊环境中屡经挫折,顽强地坚持办学,终于在 2001 年 5 月 28 日实现恢复重建。

以上三个部分构成了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教育与研究的特殊性,然而,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这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学历史发展来讲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新闻学在北大》的编辑出版,于北大是回顾历史、总结教训;于整个新闻教育界,亦是以史为鉴、反思奋进之情结。

在查阅零散繁杂、早已被历史尘封的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我既为北大前辈作为新闻专业教育和理论研究的先行者所创造的辉煌而激动不已,也为北大新闻学教育的曲折历程而扼腕叹息。从 1917 年北大开设高校第一门新闻学课程至今已近九十年,在这九十年里,北大的新闻学既有五四前后的辉煌,也有后劲不足的蛰伏;既得益于燕大新闻系的资源支持,也有失于极“左”思潮下的被迫自戕。这种复杂艰辛的曲折历程,导致北大的新闻学教育与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甚至压抑窒息。但是,北大师生对新闻学的热情从未消解,北大的新闻学教育传统从未断裂,北大新闻学发展的血脉在一代代师生中从未断绝,也永远不会断绝。2001 年 5 月 28 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又将潜伏在北大的新闻学火种重新点燃,一经点燃的火种便有燎原之势,燃烧至今已历四年有余,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同心同力,在新闻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内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重现北大新闻学的昔日辉煌开创更加绚丽的一流业绩将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新闻学在北大”,反思过去,抓住现在,放眼于未来!

肖东发

2005 年 5 月 28 日于燕北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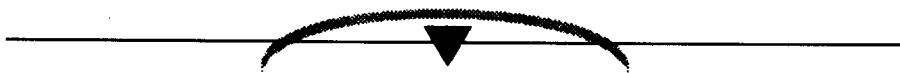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老北大时期的新闻学	(1)
引言	(1)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2)
一、外人近代报刊的出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3)
二、国人近代报刊的创办——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4)
第二节 北京大学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活动	(5)
一、维新变法与京师大学堂的建立	(5)
二、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新闻活动	(7)
第三节 近代新闻学教育在北京大学的发轫	(19)
一、开创先河的《新闻学》与新闻学研究会	(20)
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里程碑意义	(24)
三、反思北京大学与新闻学研究会	(26)
四、新闻活动,薪火相传	(29)
第四节 老北大的新闻人	(30)
本章附录	(42)
第二章 燕京大学的新闻学	(53)
引言	(53)
第一节 燕大新闻系的艰难初创	(55)
第二节 燕大新闻系的崛起与发展	(58)
一、施教方针与课程设置	(59)
二、新闻教学实践	(61)
三、师资力量的加强	(63)

第三节	北平沦陷时期的燕大新闻系	(70)
第四节	燕大新闻系早期的发展简评	(74)
第五节	成都复课时期的新闻系	(77)
第六节	抗战胜利复校后的燕大新闻系	(82)
第七节	燕大新闻系的振兴与结束	(88)
第八节	燕大新闻人	(91)
第三章	1949—1976 年新闻学在北大的发展	(126)
引言		(126)
第一节	建国初期我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发展概况	(128)
一、	1949—1951 年对旧的新闻学教育体系的改造、整顿阶段	(128)
二、	1952—1956 年我国新闻院校的调整、发展阶段	(130)
三、	1957—1965 年我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事业受挫、 缓步发展阶段	(132)
第二节	院系调整以后北大的新闻学教育与研究事业	(135)
一、	建国初期的院系大调整	(135)
二、	北京大学的院系调整及新闻学专业设置计划	(138)
三、	院系调整后北大新闻学教育与研究活动的基本状况	(140)
四、	“大跃进”时期北大新闻学教育与研究活动的中断	(150)
第三节	“文革”期间北大的新闻学教育活动	(151)
一、	“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巨大冲击	(151)
二、	“文革”期间北大新闻学教育与研究活动的发展状况	(152)
第四节	北大新闻人(1949—1976 年)	(159)
本章附录		(169)
第四章	新时期的北大新闻学(1977 年至今)	(174)
引言		(174)
第一节	劫后余生 短暂发展(1977—1978 年)	(175)
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新闻学教育的恢复情况	(175)
二、	北大新闻学教育在“文革”结束后的短暂发展	(176)
第二节	薪火相传 继往开来(2001 年至今)	(182)

一、雄厚的资源基础	(184)
二、合理的结构设置	(185)
三、新时代的新闻学教育	(190)
第三节 新时期的北大新闻人(1977年至今)	(202)
本章附录	(206)
大事年表	(215)
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27)

目 录



第一章

老北大时期的新闻学

引言

研究新闻学的历史，必然要从报纸说起，因为最早的新闻载体是报纸。或许因为造纸术和印刷术由中国人发明的缘故，世界新闻史上最早的报纸——不论是写在纸上的，还是印刷在纸上的——都诞生在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最早的进奏院状，到官报“邸报”，再到后来的官报民报并存，中国古代的报纸发展甚为缓慢。直至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近代化新式报刊的诞生与发展，才宣告了清代官报和报房京报的历史的终结，也宣告了中国古代报纸历史的终结。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报刊，催生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而在外国人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创办自己的报刊，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崭新篇章。资产阶级的政论报刊在一段时期内独领风骚，不仅对国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报刊作为宣传工具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爆发后，新闻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办报掀起一阵高潮，在近代报业发展近百年之际，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成为新闻从业人员广泛关注的焦点。此时的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许多教师和学生投身于新闻活动中，他们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报刊，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扩散到全社会，终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同时，以新闻学选修课和新闻学研究会为开端，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扎根于北大，扎根于中国：1918年北大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门新闻学课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蔡元培亲任会长。北大出版了中

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刊。老北大拥有徐宝璜这样的“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等曾任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是研究会的会员。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页。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报纸诞生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古老的中国。关于中国报纸的起源，根据现存的材料，较为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最早出现于唐代，至少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中国就已经有了早期的报纸。而唐僖宗时期的两份进奏院状在敦煌莫高窟保留了下来，现分别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这两份进奏院状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年代最早的两份原始状态的报纸。到了宋代，报纸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邸报。宋代还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民间报纸——小报。小报是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的民办报纸，成为邸报的一个重要补充。元代没有建立统一发行官报的制度，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主要集中于中书省，而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大量存在。明代由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封建官报的发布和传抄，这一时期邸报的复制方式是抄写和印刷并存。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的原件是万历年间在北京出版的一份《急选报》，这也是现存最早的印刷报纸。清代的官报制度与明代基本类似，也是通过通政使司、六科和提塘三个环节。复制方式从抄写和印刷方式并存到大部分是印刷。内容基本上是宫门钞、上谕、臣僚章奏等三大部分。清代开始出现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通称京报。清代中叶以后，一些沿海城市还曾出现过一些随时出版的单页小报。这类小报没有报名，没有标题，没有固定的刊期，内容往往是当地突发性的重大新闻，一事一报，公开发售。这类小报虽然还不完全具备报纸的条件，但已突破了旧式官报的模式和京报、辕门抄一类报纸垄断当时报业的格局，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化报纸的先声。

虽然最早的报纸诞生于中国，但是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由于清朝政府的因循守旧、闭关锁国，中国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走上国势日衰的下坡路，而此时资本主义在欧美迅猛发展。继资产

阶级革命在许多西方国家爆发以后,自 18 世纪 60 年代起,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又席卷了欧美大陆,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科学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诞生于 16 世纪的近代报刊,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传媒和舆论工具。近代报刊传入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同时的。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打断了中国古代的新闻活动,改变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成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一、外人近代报刊的出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还有信仰上的侵略——企图用十字架征服世界。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传教。英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公开活动,不得已而转到东南亚一些华人聚居地区传经布道,以便慢慢渗透和过渡。

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伦敦会于 1795 年成立,是英国基督教向海外传教的一个机构。1807 年 9 月,马礼逊到达广州,潜居在商馆里,学中文,编英华字典,翻译《圣经》。1813 年,伦敦会增派传教士米怜来中国协助马礼逊工作。经过考察,米怜与马礼逊商定在华人聚居的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当时属英国殖民地),建立能放手活动的传教基地。1815 年,米怜带领中国刻字工人梁发等到达马六甲,建礼拜堂、办学校、设立印刷所,并于 8 月 5 日出版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刊物。该刊为木板雕印,中国书式,每期 5 页,约 2000 多字。以传教为宗旨,主要内容是阐释基督教教义、介绍《圣经》,也宣讲伦理道德,介绍天文学等科学知识。第二期曾登载过的一篇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新闻,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该刊免费赠阅,传布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米怜回忆提及:“中国境内亦时有输入”。1821 年,该刊因米怜病重停刊。

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葡萄牙人巴波沙创办的葡文周报《蜜蜂华报》,由一些天主教教士编辑。澳门的葡文报刊,主要服务于葡人内部的政治经济活动,不大关心中国事务,因而对外界影响不大。

1833 年 8 月,伦敦会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成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该刊为雕版印刷,中国书式,内容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类似,主要由宗教、伦理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几部分构成,改进之处是增设了新闻和言论专栏,每期均刊载中外新闻,言论的现实针对性较强。第五期上曾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简

介近代报纸的产生、发展及出版自由观念,是中文报刊中第一篇新闻学专文。

1815 年至 19 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二百种中外文报刊,占我国报刊总数的 80%以上,几乎垄断了我国当时的新闻出版事业。以鸦片战争为界,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报纸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815—1840 年,这一时期外国人在华办报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中文刊物大多是由传教士主办,得到商人、外交官的支持,旨在宣传西方文明,提倡中外友好,消除中国人的戒心;而英文报刊多为商人出资创办,主要编撰者不少是传教士;这一时期的办报活动,主旨不在报业经营,而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宣传和情报活动。第二个阶段 1840 年到 19 世纪末,外人在华报刊,总体上是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既为列强提供情报,进行舆论准备,也为经济掠夺提供信息和宣传服务,此外也带有文化征服的意味。应该看到,尽管外报充当了列强侵略的工具,但是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们所刊载的商业经济信息以及科学文化知识,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子,促进了一部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觉醒,外报使他们增长了见识,意识到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在新闻事业方面,通过外报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中国的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认识到报刊的教育宣传功能。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人开始借鉴外报的业务经验,利用外国的技术设备,自己创办近代报刊,掀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新的一页。

二、国人近代报刊的创办——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19 世纪 60 年代,迫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岌岌可危的清政府不得不搞起了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产生了一批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产阶

级,也产生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例如,中国最早的译报、创刊于 1873 年的《西国近事汇编》;再如,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民办报纸、创办于 1874 年 6 月的《汇报》,以及我国第一份石印报纸、1884 年创刊于广州的《述报》。

1873—1894 年,是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日趋活跃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他们的报刊宣传活动的时期。王韬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杰出代表,1874 年 1 月 5 日他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



图 1-1 康有为

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这一时期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改良派宣传政治思想观点的主要讲台。

甲午战争失败后，变法图存的呼声迅速发展为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并导致了一场群众性的维新运动。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传播维新思想，促进变法活动的开展，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发挥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1895年8月15日，康、梁等人主办的《万国公报》在京创刊，同年11月，维新派建立了政治团体强学会，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1895年10月，上海也成立了强学会，并于1896年1月出版机关报《强学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批报刊，也是第一批中国政治团体机关报，标志着中国政党报纸的萌芽。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总主笔，继续维新变法的宣传，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问世不久即风行全国的近代报刊，也成为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自办报刊。同时，各地的维新派人士也相继创办一批报刊，比较有影响的有：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在长沙出版的《湘报》以及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等等。维新运动掀起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向读者进行了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而维新派的报刊实践活动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报刊言论出版的限制；第二，掀起了国人办报高潮，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第三，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报刊的编辑理念有了新的进展，为新闻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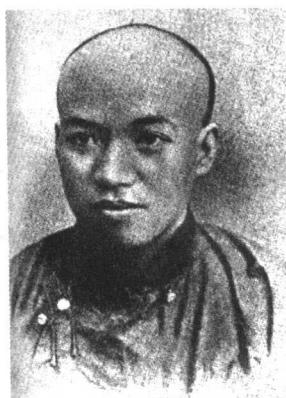


图 1-2 梁启超

第二节 北京大学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活动

一、维新变法与京师大学堂的建立

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近代史上所留下的珍贵遗产，不仅仅有那一份

份言辞犀利、饱含激情的政论报纸，更有其发起创办并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这样说道。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莫不大声疾呼废科举、兴学校，仿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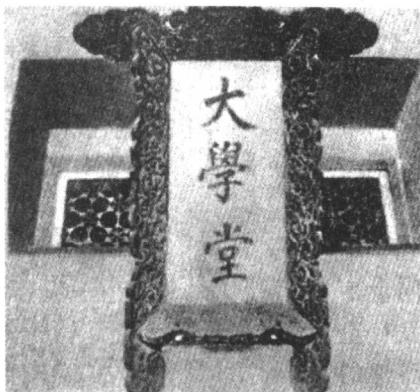


图 1-3 大学堂牌匾

1896 年 6 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李端棻这个奏折，据说正是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光绪帝对此折虽赞同，顽固派却找各种借口缓办，1898 年维新变法运动时，再次提出建立京师大学堂，顽固派仍然敷衍拖延，光绪帝几次催办，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才不得不把梁启超请来，代他们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

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898 年 7 月 4 日，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然而京师大学堂在积极筹办之时，发生了“戊戌政变”，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限于当时的环境，发展极为缓慢。后经张百熙的惨淡经营，才初具规模；辛亥革命后，1912 年 2 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 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为大学校校长，并兼文科学长。然而在当时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之下，北京大学的发展颇为艰难，直到 1916 年 12 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才有了全新的面貌。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方针的指导下，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广泛传播的背景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就从北京大学发端。

^① 萧超然、沙健孙、周承恩、梁柱编：《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 页。

二、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新闻活动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仍旧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袁世凯加紧策划复辟帝制，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操纵报刊舆论，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的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一部分率先觉醒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从热心于政党活动转向国民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先从思想启蒙着手，改造国民思想，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新青年》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新青年》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教授和学生们都纷纷以报刊为武器，向旧文化、旧制度发起猛烈的攻击。教授们办的刊物，最主要的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学生办的刊物中，最有影响的要数《国民》和《新潮》，这些刊物在国民启蒙、反帝爱国宣传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在李大钊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广泛传播。

(一) 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青年》与《每周评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该刊为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出刊9卷54号。《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笔名三爱、实庵、只眼等，安徽怀宁(今安庆)人。1903年，他协助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担任编辑。1904年在安庆与人合作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并任主编。辛亥革命后，面对黑暗的现实，陈独秀革命信念日益坚定。1914年，他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月刊，并在报刊上发表时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志气。1915年夏，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危难时局中，毅然回国筹办《青年杂志》，由上海



图 1-4 《新青年》

群益书店印刷发行。

在《青年杂志》上，陈独秀连续发表了《敬告青年》、《一九一六年》和《吾人之最后觉悟》等文章。在这些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章中，他高举科学、民主旗帜，热情歌颂西方资产阶级自由、独立、平等、人权思想，号召青年奋起，自求解放，摆脱中国数千年来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封建思想的羁绊。可以说，自《青年杂志》起，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刊初创阶段，影响不大，出满一卷后即暂告休刊，经过半年调整，1916年9月，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影响日益扩大。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出版。

《新青年》的北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一件大事。它为此后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和不断掀起高潮起了不可忽视的铺垫作用。首先，《新青年》在办刊资金方面有了充足的保障。原来的《青年杂志》发行量并不大，1916年出满一卷后就曾因销售甚少而暂告休刊。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掌握一定的财权，因此《新青年》的持续出版有了资金上的保障，免除了后顾之忧。其次，《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办刊基地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主办人身为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大学教授，杂志的声誉、地位、影响都有了显著的不同。再次，《新青年》北移后，一批进步教授、学者加入了编辑部队伍，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编发展成为拥有一支优秀编者、作者队伍的同人刊物，学术资源更为丰厚。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社友组成编辑部，共同研究，轮值主编，轮值编辑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主要编撰人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这一编撰队伍结成了包括左中右三方面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始终成为主要阵地。它的主要宣传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新青年》大力介绍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想、新道德，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并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逆流，展开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第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新青年》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主要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第三，发起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初《新青年》第2卷5号发

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在第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学。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是《新青年》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的英勇战士。

《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惊醒了一代青年，广大读者纷纷致信《新青年》杂志，赞扬《新青年》在“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认为《新青年》是“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17年，《新青年》最高销数量每期达一万五六千份。1919年又再版第1—5卷，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①北移后的《新青年》，成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号角，一次次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1917年到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中国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人们更加渴望通过报刊了解国内外政治局势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尤其是1918年末1919年初，国内外形势又有很大变化，引起人们对政局的强烈关注：其一，中国在即将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能否改善国际地位；其二，北洋政府和南方军政府的和谈能否给中国带来光明的未来。《新青年》作为大型理论性月刊，刊期长，又不能准时出版，已经不能适应广大读者对于时事评述的渴求；部分编撰者所坚持的“不谈政治”的宗旨，也极大地限制了《新青年》的宣传作用。在此形势之下，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另外创办一个刊物，于是《每周评论》诞生了。

《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份4开4版的小型政治报。共出版了37期，前25期的主编是陈独秀，主要编撰人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等。《每周评论》是为弥补《新青年》作为一个标榜“不谈政治”，主要进行理论斗争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刊物之不足而发起创办的。社址设在北京市内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

为了扩大《每周评论》在读者中的影响，《新青年》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

^① 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社会思想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0页。